

吳越文化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吴越文化

张 荷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沈阳

辽新登字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文化/张荷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4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ISBN 7-5382-1436-4

I. 吴… II. 张… III. 文化-中国-华东地区
IV. G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496 号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吴越文化

张 荷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10,000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8.5 插页:6

印数:5,001—9,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越男 谭 坚 责任校对:一 丁

封面设计:沈 放

ISBN 7-5382-1436-4/C·85

定价:12.00元



铜质房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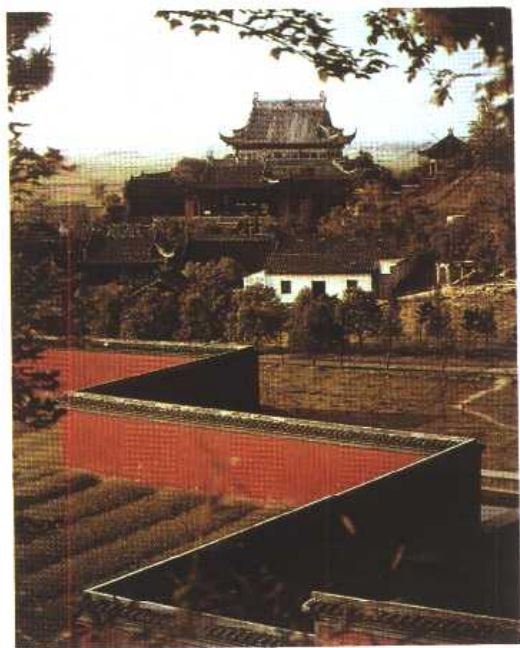
水乡脚划船



苏州听枫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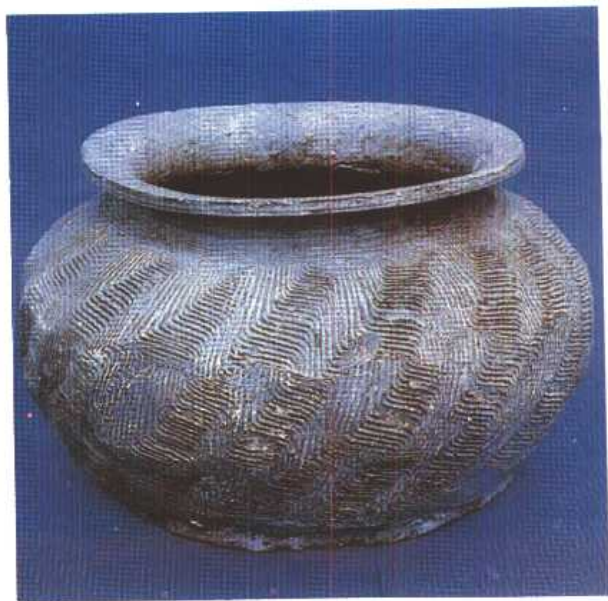


绍兴八字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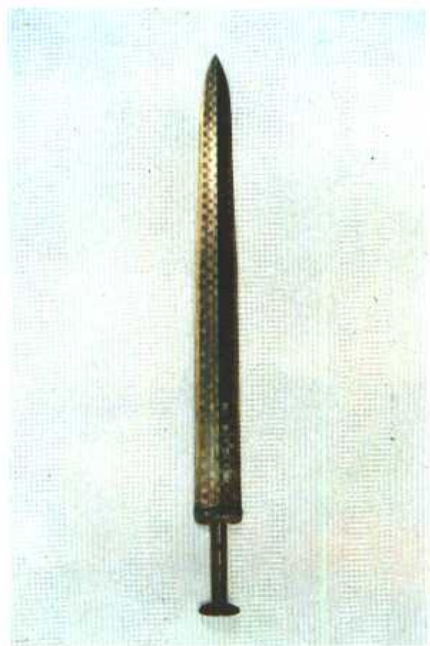


禹
庙

几何印纹硬陶罐



越王劍



苏州女说书艺人



DI65/09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序

李侃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民情，而国情与民情又都与历史传统有割不断的联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但是它又不可能抛开历史文化遗产，完全从头开始。因此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任务。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全盘继承”，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对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否定，一概排斥，如果不是思想的幼稚，就是另有用意，而且同样是办不到的。至于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发生这样那样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这就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的。对于如此悠久而复杂丰富的传统文化，不要说不可能轻易地做出什么“结论”，就是理出一个比较

清晰的头绪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前一个时期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大多是偏重于宏观的论述，或者就某一个学派（如儒学）、某一种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进行研究，这当然也是很必要的。然而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又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的大国。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而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都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这种各具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采、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对这些地方文化，进行历史地、具体地考察和研究，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出中华文化的同一性，这不仅对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历史文物的不断发现和整理，随着研究视野的开展和研究领域的拓宽，为地区文化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值得高兴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这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丛书”将包括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等。构成了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到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是怎样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长期积累起来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凝

聚着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文化也会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流才能流长，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没有根或断了根的文化，也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不免于枯萎的。在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有悖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良知，也有悖于历史的科学精神。因为这种数典忘祖的虚无主义，只能导致民族精神的涣散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因此，出版这套“丛书”的一个重大意义，还在于通过对祖国各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但是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的。而当今之世，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各种社会思潮此伏彼起，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加深对祖国优秀文化的了解，从而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心，则尤为重要。

对古代地区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付出艰苦的劳动，何况万事开头难。我赞赏《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作者们勇敢的开拓精神，和他们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所做的有益尝试。也赞赏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和气魄，热心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精心组织、大力支持《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的出版。像任何新的事物一样，对古代地区文化的研究在开始的时候，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世界上哪里会有一开始就十全十美的事物呢！

我自己，有感于作者们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出版者勇于开拓、努力创新的精神，在这里说一点粗浅的感想。衷心祝愿作者在坎坷的科学道路上，继续奋进，勇敢攀登。

1990年7月25日

编者札记

我们一直在探讨“文化”。

尤其是近些年,在“交叉科学”的旗帜下,与文化“联姻”的学科纷纷涌现: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地理学等等。形式的媾和不排除牵强的因素,但其主体却反映了时代学术的趋向。它既承认传统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又拓宽和丰富了人类的认识视野,为文化学研究带来一片生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地域文化(Ri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不同于文化地理学(Geoculturelism)。它们都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等。但在某些方面,地域文化又与文化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一般说来,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的,其中的“地区”(District)概念具有极强的地理学意义;它疆域明确,系统稳定,与现实的“地区”是吻合的。而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Region)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当然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学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迁移,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如“齐

鲁”概指山东，“关东”泛称东北等，在这里“地域”与“地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这是地域文化与文化地理学的“小异”之处。

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显然我们不应忽视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

古人已发现：不同地区的民俗传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通过各自的行为系统表现出来。《礼记·王制》中记载了“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做法，就是要通过诗歌体察各地的民情。《诗经·国风》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诗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文化区域的风土人情，是将文化按地域类分的先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叙了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的故事：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今德之后，谁能若是！’……”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季札观乐，能够准确地领悟各首乐曲表现的“国风”，他对音乐的精通固然令人敬佩，而诗乐中蕴含的“地域特征”也确实是鲜明可鉴的。

《汉书·地理志》中已明确地提出了“域分”（即按不同的历史区域划分民俗民风）的概念：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

把人的行为和观念归因于两个因素，即水土的构成和王侯的引导。这个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就现实而言，地域文化的形成也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结构。

首先说到自然环境。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大体可划为三个自然区，横跨六个温度带，地理属性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古人早已注意到了水土风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并多有论述，仅举数例：

“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嗇。”（《邹县志》）

“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夸张，民醇俗茂，悃悃无华。”（《陵县志·序》）

“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刘禹锡《送周鲁儒序》）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

“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旧《浙江通志》）

从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地感受到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仅是一个侧面。明人钱澄之在《记黄檗山居》一文中谈到吴地之人曾笑话他的家乡（桐城龙眠山）园亭简陋，他反诘道：“吾乡有真山水，何以假为？唯任真，故失诸陋，洵不若吴人之工于作伪耳。”山水奇秀之地，当然无须“工于作伪”，而吴人的巧于

凿池叠山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看来自然环境不但影响一地的风俗人情,更影响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甚至民居建筑,它对于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其次说到社会结构。华夏文明史跨越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历史变迁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仅以“吴越”为例,春秋之际,吴越两国连年征战,尚武习俗蔚然成风。史载:“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汉书·地理志》)“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左思《吴都赋》)但晋永嘉之后,吴越的民风却发生了转变。“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明刘槃《成化记》)“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碑记》)在这个从“尚勇”到“崇文”的社会风气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未必绝对,但晋“永嘉之乱”后文人的大量南迁避祸,无疑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再如:

“蕲春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隋书·地理志》)

可见“平陈”对蕲春风俗变更的作用也是明显的。当然,历史的作用不仅限于对传统的改变,更在于对传统的保守和延续。徽州地区宗法制度的保持与传承就是明显的例证: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渗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甲,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二)

“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家,

不动一坏；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新安旧志》）

如此森严的宗法制度，无疑对徽州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这两大因素，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九十杂述》）黄宾虹先生一语道破了个中三昧。

当然，作为一门兼济古今的“新学”，地域文化的研究不会仅限于对民俗风情的直观探讨，也不会停滞在对旧说的注释与阐述上。它将用科学的历史观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组合形式和流变方式，进而探索其深层结构。立足于这一文化视角，我们将从中国传统形式的“大一统”和观念的“大一统”的背景下，看到一组生机勃勃的文化景观。

“新学”的建立，还须要有新的研究方法相伴。在地域文化的构建中，似乎大有改变方法的必要。我们知道人与文化密不可分。但就演化方式而言，人类生灭有序，文化却变衍无常。我们以往许多文化学研究大概是受文化载体的生灭过程的影响，总是以时间为主线展开论说。这种方法便于一个学说的条理化，符合正常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值得申明的是：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以时间为主线的研究是一种线性的（或称“一维的”）研究，这不可能涵盖人类的全部文化。因为某一文化的形成、演变或进步过程，不完全是按照时间排序的，时间仅表现了文化的流变方式，却不能完整地反映文化的组合形式。应当看到：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承载。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

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基于所谓“文化时空观”的臆想，我们不妨把文化作为环境的一个“人造部门”，在地理与文化相纽结的背景下，展开一种立体的（三维的）文化学研究。在这里，时间已成为“匆匆过客”，为一幕幕历史活剧提供变换的可能；空间却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成为文化存在的根据。只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展开论说，我们才能认清文化全方位占有人类的事实。其实所谓方法的改变，只是时间与空间的错位，这种主次交换的最基本的心理依据是：地球是人类永难变换的载体，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和它的文化学意义。

显然，以空间为主线的研究具有非传统的特征，但它不是反传统的，而是对传统的一种发掘和再认识。其实古代的学术思想流派常常有明显的地域性，《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甚至用地名标志学派。侯外庐先生明白地指出：

“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特点，大略的形势可以描述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后来可能是随着陈国的一些逃亡贵族而流入齐国。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中国思想史纲》）

这种带有地域特征的学派分析，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强烈的空间意识。

界说已划定，基础已奠立，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当我们拂

去岁月的风尘,步入中华文明的千年古殿,一种无名的压迫之感流变于心头:时间逝去了,历史活剧收场了,旷野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模样。那高耸的山峰可曾纪录着古战场铁马金戈的喧嚣?那残存的断壁是否映照出连云接日的霓裳舞姿?姜里的蓍草、天坛的净土、东海的蜃景、西域的驼铃……这些浸润着一个偌大民族古老精神的自然景观,潜藏着哪些深不可测的文化内涵?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也湮灭了平民,留下的只有散在的文化遗迹和如峰的圣典。在故纸的围迫之中,我们曾困惑,现在我们需要抖擞精神,为构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再来一次艰难的起步。

快到世纪末了。

人类在本能的驱动下,开始了又一个百年周期的小结。

我们还在探讨文化!

.....

1991年4月